

華裔賄賂哈佛教練案反轉！“體育爬藤”路有多難走？

兩年前,iTalkBB 華人總裁趙捷(Jie “Jack” Zhao,音譯)因涉嫌賄賂哈佛大學的前擊劍教練彼得·布蘭德(Peter Brand)150萬美元,讓兩個兒子順利進入哈佛大學讀書,而遭到FBI逮捕。

近日陪審團認定兩人涉嫌密謀和賄賂罪均不成立,兩人都獲判無罪。

起訴書:有人運作,兩個兒子都讀了哈佛

聯邦司法部公佈的起訴書顯示,布蘭德是哈佛大學擊劍項目的首席教練,掌管着招收特長生的絕對權力。在布蘭德的運作下,趙捷的兩個兒子都順利進入了哈佛大學。

首先是在2012年5月左右,布蘭德讓一位同行暗示趙捷,他的兒子如果想讀哈佛大學的話,不需要是非常杰出的擊劍運動員,只需要一個很好的回報,就可以招收他們。因此,2013年2月,趙捷向華盛頓國家擊劍基金會機構捐贈了100萬美元。當年12月,趙捷的大兒子被哈佛大學錄取為擊劍特長生,並於2014年秋季入學。

此後,趙捷開始直接向布蘭德付款,幫助償還了布蘭德的汽車貸款和水電費賬單,還支付了布蘭德兒子的大學學費,並通過慈善機構將資金匯入布蘭德賬戶。

2016年,趙捷以近100萬美元的價格買入布蘭德的房子,當時布蘭德這個房子的價值僅為54.93萬美元。也就是說,趙捷以溢價近45萬美元的方式,變相給布蘭德送錢。17個月後,趙捷賣掉了房子,虧損了32.45萬美元。

不僅如此,布蘭德拿到錢購買了豪宅後,趙捷還出了15萬美元給布蘭德裝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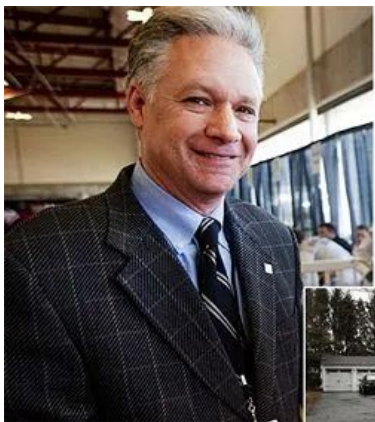
2017年,趙捷的小兒子又被哈佛大學以擊劍特長生的方式錄取。

審判:只是好友之間的借貸

趙捷的律師William D. Weinreb和布蘭德的律師R. Matthew Rickman, Douglas Brooks先是傳喚了11名證人出庭作證,並出示了數百份證據,證明趙捷的兩個兒子是因為成績優秀被哈佛大學錄取,趙捷的兩個兒子也出庭作證,並曬出了高中和大學成績單,以及他們完整的哈佛申請材料,來證明他們的成績的優秀。比如:SAT考試成績滿分,四年高中只有一個B,擊劍排名全美前列,進入哈佛後擔任擊劍隊長,都表明他是靠實力進入哈佛大學的,而不是靠父親的行賄。

這樣一來,就可以證明趙捷和布蘭德之間的經濟往來,與兩個兒子讀哈佛大學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關於趙“變相”送錢給布蘭德的事。趙的律師辯稱,買房是投資,有賺錢也有虧損。其次關於花錢給布蘭德裝修一事,律師表示趙只是在財務上幫助有需要的好朋友,也有證據表明,布蘭德在母親去世後拿到遺產時,便給趙償還利息,來證明這筆錢只是朋友之間的借貸。



聯邦檢察官所仰賴的重要證人是趙的兒子們的擊劍教練亞歷山大·雷吉克(Alexandre Ryjik),他也是中間人,介紹趙和布蘭德認識並協助“行賄”的人,但是趙和布蘭德的律師對雷吉克的證詞提出質疑,並表示這位關鍵證人是“騙子和罪犯”。

最終,陪審團經過6個小時的商議後,認定趙和布蘭德無罪。

誤入歧途的“體育爬藤”

這幾年,“體育爬藤”的話題變得越來越火熱。冬奧會上亞裔扎堆的美國花滑隊,不乏來自耶魯、布朗名校的學生。

美國記者琳達·弗拉納根(Linda Flanagan)多年來發現,很多父母不惜透支錢包和身心讓孩子走體育路線。作為一位前田徑教練,她有過十幾年的教練經歷,在她看來,現在很多美國家庭已經在“體育爬藤”路上失控而不自知。

運動員比普通學生高出好幾倍的錄取率,讓人低估了“體育爬藤”的難度:美國大學樂於吸納運動員,但越是優秀的大學,對運動員的水平要求就越高。像滑雪的谷愛凌、花滑的陳楷雯都屬於國內,甚至國際頭部選手。

練體育未必是逃離“內卷”,甚至可以說是一條更“卷”的路:如果不是精英級別的運動員,那麼“爬藤”路上,依然需要不斷提陞比賽排名,來向教練“推銷”自己。如果沒有被大學教練看上,沒有他們的推薦信,大學很難會看上“白板”運動員。

與此同時,學業也還是要“卷”的。普通學生練體育,是練個錦上添花,而一旦走上“體育爬藤”的路,那就真的是學業、體育兩手都要抓,兩手都要硬。

琳達·弗拉納根在新書《Take Back the Game》中,她詳盡地記錄了

自己的觀察和思考。她給美國家長的“避雷指南”,也可以成為中國家長的前車之鑒。

01 “體育爬藤”:卷,才是真相

美國頂尖大學越來越難上,體育似乎是一個可以“降低門檻”進入大學的渠道。就拿哈佛來說:

2025屆的新生有10.4%是運動員,這幾年新生中體育生佔比都在10%~12%。

學術表現評分在一等或二等的運動員被哈佛錄取的幾率為83%,而有着同等學術表現的非運動員學生被錄取的幾率只有16%。

運動員的SAT平均分為1397.4分,相比之下,非運動員學生的SAT平均分達到了1500.8分。

作為一位前田徑教練,琳達·弗拉納根深諳大學對運動員的剛需——“只要大學校隊有希望獲勝的教練,那就每年都需要新的運動員加入。”

在美國,如果只是把體育運動當作個人特長,那與普通學生的申請沒什麼差別。而走運動員路線的孩子則需要在高中時到美國大學體育協會(NCAA)注冊,然後以學生運動員的身份申請大學。作為運動員,學校通常不限制專業,但是學生必須為大學的校隊效力。

NCAA按照學校開設的體育項目,是否提供獎學金等標準,把學校分為了D1、D2、D3三類。大家熟知的八所藤校和斯坦福都屬於級別最高的D1,麻省理工、約翰斯·霍普金斯雖然屬於D3,但有部分項目可以參與D1級別的比賽。而D1大學的校隊教練,甚至在決定錄取時有很大的話語權,只要是他們看上的運動員,有很大可能可以被學校錄取。

值得一提的是,NCAA設置了運動員的最低分數線,如果學業成績太差,教練覺得學生很難被錄取,也會直接PASS掉。再加上選拔、運動表現、比賽成績等綜合評判,運動員圈子的大學錄取率其實並不算高。

就拿高爾夫來說,2020年的一份數據顯示,高中參賽的男子有168,480人,女子有96,071人,能在大學繼續打高爾夫的比例分別是7.0%和7.5%,而能進入D1學校(八所藤校都在這個級別)花名冊的只有1.5%和1.8%。可見,真正以運動員身份進入藤校的比例,比藤校的總錄取率還要低。

在參加D1比賽的選手中,男子和女子國際運動員分別佔到了21%和31%。算算人數可能有好幾百,但是整個D1有363所學校,平均到每所學校,高爾夫國際運動員也就屈指可數的幾個名額了。

這說明,就算是優秀運動員,也未必有實力進藤校。也許還需要靠老爸借教練一點錢啥的……

02?父母透支錢包和身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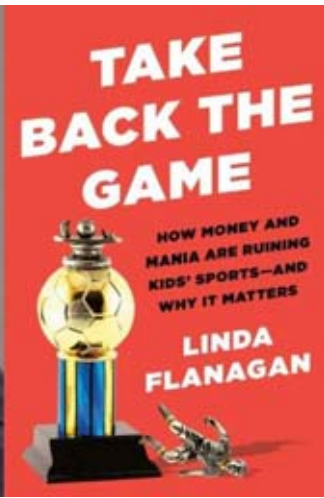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因為運動員這條路不好走,投身體育的孩子們也更加需要父母在背後支持。單單說金錢投入,早在2017年,猶他州立大學的一項調查就顯示,很多家庭把10%的收入用於孩子的體育運動,包括聯賽、訓練營、裝備、日常訓練和體育旅遊。

而2019年,非營利組織Aspen又公佈了一項全美調查,發現有些父母在孩子運動上的投入高得驚人。

即便是那些比較便宜的運動,有些父母一年在一個孩子身上投入也會超過9,000美元。而像

花費算中游的網球,有些家庭的年投入更是高達3萬4900美元。

《今日美國》曾報道過美國達拉斯的戴維斯



一家,他家的兒子伊恩很小就對高爾夫感興趣。從伊恩7歲第一次參加高爾夫錦標賽開始算,7年間父母已經為兒子的運動投入超過6位數。而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數據,美國中產的收入區間在4~12萬美元。後來,為了讓兒子獲得更專業的培養,戴維斯一家乾脆賣掉了達拉斯的房子,搬到了弗羅里達州。

琳達·弗拉納根認為,更嚴重的問題在於,有些父母過於看重孩子的運動事業,甚至把自己的價值捆綁在孩子的運動上,把孩子在比賽中的勝負看作自己作為父母的成敗標準。很多報道中所說的“家庭生活失控”就是指這樣的情況。

就比如說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體育旅遊,就佔了運動花費中的大頭。說是旅遊,其實重點還是在於比賽。

2021年,全美體育旅遊的人次達到了1.75億,體育旅遊的家庭更是在酒店度過了6650萬個安睡的夜晚。家庭為此要付出的不僅僅是金錢,還要犧牲很多家庭生活,而旅行的舟車勞頓更是難以想象。

有的父母放棄了周末和休假,帶孩子去比賽;有的花費重金為孩子支付裝備、私人教練和俱樂部的費用;還有的選擇擔任教練、團隊管理員、俱樂部司機等相關的職位。而父母在孩子的運動上投入越多,往往也會希望孩子的運動成績更好,但可惜的是,事實並不總會像父母期望的那樣發展。

03 競技體育之外,出路何在?

琳達指出了另一個非常容易被忽視的嚴峻問題——孩子能不能找到競技體育以外的出路?這個問題其實源於一個現象,它被心理學家稱為“運動身份喪失”(athletic identity foreclosure)。而歷史學家史蒂文·明茨(Steven Mintz)很早就注意到了,那些很早就投身於某一項運動的青少年往往會認為自己是“橄欖球運動員”“游泳運動員”“跑步運動員”等等,而很少發展體育競賽以外的興趣、個性。

這個潛在的問題在美國其實很嚴重,根據Aspen的調查,如今45%的兒童只參加一項運動。這對孩子的發展很不利。

一方面,過早地進行某一項的專業化訓練,會增加孩子受傷的概率。長時間從事某一種運動,孩子們的關節、肌肉都要承受很大的壓力,傷病也隨之而來。

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科齊醫生(Mininder Kocher)發現,波士頓地區青少年的前交叉韌帶重建術在2004年約有500例,到2010年已經到了2500多例,增長了400%。這就是孩子過早進行高強度專業化訓練的影響。

而這些傷痛,其實也會影響孩子後續的運動生涯,他們可能會變得更容易受傷。

另一方面,孩子們需要“運動員”以外的身份,或者說,需要體育以外的發展路線。

美國花滑選手蕾切爾·弗拉特(Rachael Flatt,下圖)對此就有深刻的感受。她的父母要求她,如果想要繼續滑冰,就要先保證學習不落後。於是在備戰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期間,儘管缺了三個月的課,但她一邊訓練,一邊補學業,最終不僅在冬奧會奪得了第七名,還順利進入斯坦福繼續學業。

大學期間,她也在高強度的訓練時兼顧着學業。可即便有着斯坦福這樣的名校學歷,她在退役後仍然陷入了一段掙扎。

她意識到,“直到退役,運動員們才恍然發現,如果沒受過什麼教育或者培訓來引導你步入社會的話,那你接下來的生活大概就要不大走運了。”

歷史學家史蒂文對現狀是有些悲觀的,他看到一些孩子因為過早投入專業化訓練,太早把自己和比賽綁定一起,變成了二元思考者,認為事情不是好就是壞,不是輸就是贏。

有些孩子甚至連放鬆去玩都做不到了,“如果你把所有的規則都取消,讓他們自己去玩,去享受,他們反而會很糾結。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怎麼去玩鬧,怎麼去享受運動中的快樂了。”

用琳達的話來說,選擇靠體育來升學而成為青少年運動員的孩子,早早就在做一份全職且無薪的工作。但這份工作的日後保障,卻被很多家庭忽視了。

04 “爬藤”不是終點 運動惠及一生

作為一位教練,也作為一位母親,琳達也多次反思,自己讓孩子練體育的初衷究竟是什麼。除去那些孩子的賽績帶來的虛榮心、成就感,最樸素的目的不過是希望孩子身體強健,生活幸福。而成為運動員,或者說體育爬藤,不過是實現階段性目標的手段之一。

根據美國大學體育協會的數據,美國有1,093,234名高中橄欖球運動員,其中71,060人(6.5%)會在大學繼續打球,而只有1.2%的大學生運動員會進入職業隊伍。

也就是說,只有0.08%的高中橄欖球運動員會真正成為職業運動員。絕大部分孩子,在高中或大學做運動員的經歷,只是人生中很小的一段旅程。

這樣看來,父母們或許真的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看待孩子的運動生涯,而琳達也為困惑的家長們找到了幾條“黃金守則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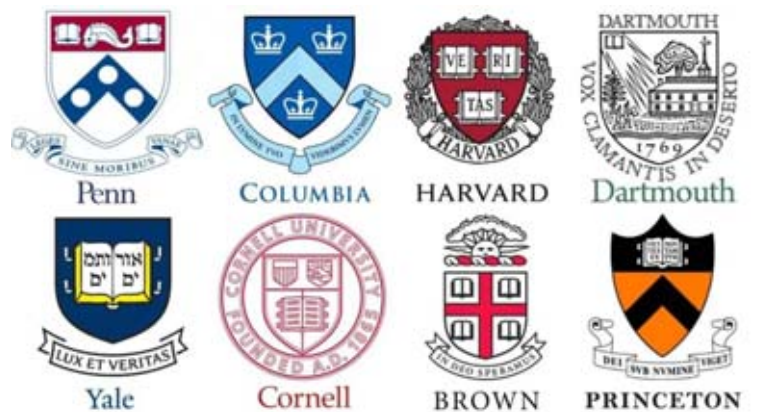
一方面,要掌握生活的主動權。“孩子的體育之路很重要,但是真的重要到生活中的一切都要為此讓位了嗎?”這是琳達自己在養育孩子時,也時常思考的問題。

兒童和家庭治療師理查德·魏斯伯德(Richard Weissbourd)把父母們之間的不斷攀比,稱為一種不斷升級的“傳染病”。家長們不斷地相互刺激:你給孩子投入了更多錢,那我也不能落下風;你的孩子拿了好名次,那我的孩子也要相應地贏回來……

要超越這種攀比的“傳染病”,就需要家長和孩子一起學會享受比賽。

教孩子去欣賞對手的技術,寬容隊友的失誤,還有尊重不完美的裁判,這可以幫助孩子培養同理心——他們會明白,無論自己的情緒有多麼熱情,都不是唯一重要的,因為其他人的感受和經歷也值得尊重。

另一方面,不要讓孩子過早投入專門的專業化訓練。



尤其對年齡小的孩子來說,他們對一項運動的興趣並不持久,可能要嘗試過很多運動,才會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。

Aspen的調查顯示,美國很多孩子平均在10.5歲時就不再定期參與某項運動,而他們平均堅持運動的時間也就2.9年。也就是說,很多孩子雖然很早就開始運動,但是他們其實最後走不了體育爬藤這條路,他們有其他適合自己的道路去走。

如果早就讓孩子進行專業化訓練,容易受傷不說,或許孩子並不會像父母期望那樣長久地堅持下去。

而且,即便是體操、花滑這種考驗童子功的項目,很多專業運動員也推薦在孩子低齡時,多涉獵,多嘗試。

2016年,一項對美國大學一級運動員的研究還發現,很多很有競爭力的運動員直到高中才開始將運動項目限制下來。大多數一級運動員在高中階段都沒有被歸類為高度專業化的運動員。

同時,大學教練也希望運動員能具備一系列運動技能和經驗。康奈爾大學的足球主教練戴維·阿切爾(David Archer)說,他們看重有不同運動經驗的孩子,因為這些孩子接觸過不同類型的團隊和教練風格,視野更廣闊,也更容易接受反饋。

